

中以交涉： 李登辉访以计划夭折始末

陈来元

1993年5月至1996年7月,我担任中国驻以色列大使馆政务参赞。这期间,中以两国友好合作关系总的来看发展较好,双方也较满意。但与1992年中以建交前相比,两国在台湾问题上的分歧则渐渐显露出来,成为两国关系中时常遇到的一个麻烦问题。虽然这在两国关系总局中仍属支流、枝节,但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双边关系的和谐发展,故中以双方都十分重视,并通过共同努力避免和克服。

以色列在台湾问题上实用主义抬头

中以建交前,以色列历届政府都对台湾问题采取低姿态。从以色列建国到中以建交,以色列历届政府鉴于其在阿以冲突问题上对中国政治上所求较大,同时从重视中国大国地位及看重中国潜在的巨大市场等长远考虑出发,在台湾问题上一直采取十分谨慎的态度。新中国成立不久,以色列就宣布予以承认,成为整个中东地区承认我国最早的国家。在为恢复我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的斗争中,以



拉宾总理(前排中)与中共代表团合影,右三为作者

色列与中国当时虽没有外交关系,却毫不犹豫地投票对我予以支持。中国在不同历史时期曾批评过以色列推行犹太复国主义和侵略扩张政策,以色列对中国的指责则保持沉默,可谓骂不还口。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长期以来以色列从不与台湾当局发生官方、政治关系。

两国建交后,以色列对台湾问题的立场却逐渐产生了变化。以色列从与台湾互设经济贸易(后改为经济

文化)办事处、默许台北驻特拉维夫办事处在以色列代发签证、搞“双十节”伪庆活动以及默许台湾高级官员访问以色列,直到谋求向台湾出售武器,甚至同意台湾当局领导人李登辉到耶路撒冷朝觐,对以色列进行“私人”访问,与台湾当局的关系一步步地向前发展。虽然以色列政府口头上也一再重申其恪守中以建交公报的原则,坚持一个中国的立场不变,但在实际行动上却在不断违背诺言,对台

立场严重倒退。

以色列政府对台立场逐步出现上述变化,既与当时国际气候及台湾当局大搞“务实、弹性外交”等外因有关,也是其在新形势下实用主义倾向有所抬头这一内因使然。鉴于以色列长期追求的以中建交并以两国建交带动一些亚非国家与以色列建交的目的已经达到,中东和平进程的发展也使以色列对中国在政治上的所求相对有所减少,因而其同台湾当局发展关系的顾忌也较前减少,同时鉴于经济因素在国际关系中的作用不断上升,以色列政府在台湾“金钱外交”的利诱下,企图既进一步同我加强关系,同时又与台湾当局发展关系,从而脚踏两只船,两头受益,捞取最大经济实惠。

▶ 绝不能允许以色列对台售武及让李登辉访以

中以建交后头两年,即1992年和1993年,中国与以色列在台湾问题上的矛盾大体有以色列与台湾当局互设办事处、以色列默许台北驻特拉维夫办事处代发签证、台湾官员访以以及以色列打算向台湾出售武器等几个方面。相比之下,售武问题更关乎我国国家安全与和平统一,较之其他问题更为敏感、重大。因此,中方在就上述问题与以色列政府分别进行交涉的同时,把外交交涉的重点放在阻止以色列企图向台湾出售武器这一重大问题上。经过耐心做工作,中方终于成功地使1992年以色列想向台湾出售武器及1993年以色列打算参加台北武器展览会的计划胎死腹中,有效地遏制了以色列和台湾当局军事关系的发展。

1994年至1995年,中以在台湾问题上的分歧有新发展,主要问题有:以色列默许台办处在以色列搞“双十节”伪庆活动,并允许以色列中、下级官员出席;向台办处颁发具有半官方性质的汽车牌照;与台湾经贸官员的互访增加。特别是以色列政府同意李登辉于1995年4月访以,使两国在台湾问题上的矛盾发展到了一个顶点。允许李登辉访问以色列是直接侵犯中国主权、干涉中国内政、阻碍中国统一大业的重大政治问题和原则问题,我们决不能让台湾当局在以色列搞分裂祖国的阴谋得逞,也决不容许与我建交国在此问题上干涉中国内政。因此,全力以赴地开展这场外交斗争,千方百计地取消这次访问,则成为当时两国关系中中方的一项中心工作,也是中方在以色列开展的涉台斗争中最重要、最关键的一场交涉。这场斗争的胜利不但将有力地遏制以色列与台湾当局政治关系的发展势头,而且对台湾当局在中东、在国际上大搞“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的阴谋也将是一个沉重的打击。

为取得这场斗争的胜利,我们大使馆在国内正确领导下,对当时的形势进行了仔细研究和缜密剖析。

李登辉在国际上、在中东地区大搞“弹性外交”“务实外交”,蓄意制造“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已司空见惯。他挖空心思、变着法子搞什么“度假外交”“过境外交”“体育外交”等,某些企图对我遏制的西方国家及极个别见利忘义的其他国家与台当局勾勾搭搭,甚至弃我就台,这类情况也时有发生。像李登辉要钻到以色列活动并获得以色列当局的同意,这种情况在国际上也并非绝无仅有。因此,我们对这个问题不必大惊小怪,自乱方寸,而应面对挑战,沉着应

付。

但这场外交斗争的形势又有其自身的特点。第一,1994年春天达赖喇嘛以“私人”名义访问以色列,若一年后李登辉再接踵访以,势将对中国造成更大的政治危害,我们说什么也不能让他的阴谋得逞。第二,中东虽是台湾当局开展“弹性外交”“务实外交”的重点地区之一,但李登辉本人对该地区的访问尚属首次。若让他的如意算盘成功,势必将在中东开创一个恶劣的先例,这是我们必须坚决加以制止的。第三,李登辉访以不是尚在磋商之中,而是已经确定,并且以方同意其来访的决定是由以色列最高实权人物拉宾总理做出的。生米虽未煮成熟饭,但已下锅,要以色列政府改变决定绝非易事。第四,以色列政府同意李登辉访问的回报是台湾当局向以色列提供3亿美元的投资。对当时仅有500多万人口的弹丸小国以色列来说,这笔投资无疑不是个小数,因而受到以色列政府的垂青,更受到以色列经济界一些人士的热列欢迎。以方不会轻易放弃这相当可观的经济利益,更增加了我方进行交涉的复杂因素。第五,耶路撒冷是世界三大宗教圣地。李登辉访问以色列的借口是,他要以基督徒的身份到基督教圣地朝觐。以色列一向不拒绝世界上任何个人或宗教信徒到以色列旅游或朝觐,这为我方粉碎李登辉访以的图谋也增加了困难。

但从总体上看,中以关系友好,以色列一直重视我大国地位,在政治上对我仍有所求,经济上更十分看重我巨大市场,故虽一心想同台湾尽量多地发展关系,但仍有所顾忌、节制,原则上以不超出我承受能力为限。另一方面,拉宾总理对中国还是相当友好的。他1994年曾访华,对中国印象

很好。拉宾此次同意李登辉访问以色列,固与其在价值观念上同我存在差异有关,但更主要的是受经济利益驱使及以色列经济界一些人士给他施加了巨大压力所致。若我工作得法,工作到家,促其改变决定仍是有可能的。

总而言之,从以上分析中,我们不仅清楚地认识到这一矛盾早晚会发生的必然性,以及我方不遗余力地争取这场斗争胜利的必要性和重要性,预计到这场交涉的复杂性和艰巨性,而且也看到了争取斗争获得成功的可能性,从而增强了进行这场交涉的决心和胜利信心。

► 李登辉访问以色列成了一枕黄粱

从实际出发,采取正确策略,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因势利导,妥善处理好一系列主次关系、重点和一般的关系以及准备好特殊情况下的应对措施,是赢得这场外交斗争胜利的关键和保证。在国内正确领导下,我们根据上述原则,确定了如下对以交涉的方针和策略:

一是以国外为主进行交涉,国内外密切配合,协同作战。驻以使馆在外交第一线,可及时掌握第一手情况和事态发展的新动向,可同对方高层领导直至最高决策人直接联系和当面做工作,对外交涉较为有利、有力、有效,应多做工作。与此同时,国内也积极对以色列驻华使馆做工作。前后方互相通气,互相配合,共同战斗。

二是重点做拉宾总理的工作,同时做以色列其他高层领导和有关人士的工作,为促使拉宾改变决定创造条件。拉宾是决策者,是关键人物,

但在面见他做工作之前有必要先“扫清外围”,为他转变立场打下一个较好的“群众”基础。为此,我国驻以色列大使林真和我分头去做以色列总统、议长、外长及多位内阁部长、外交部主管官员、以色列前任驻华大使和经济界有关人士的工作,一方面说服他们,一方面请他们协助做拉宾总理的工作。在此基础上,林真大使再去面见拉宾,重点做他的工作,阐明我原则立场,对其晓之以理,动之以情,要求其从中以友好关系的大局出发,改变同意李登辉访以的决定。

三是在做拉宾“外围”人士的工作中,主要做以色列外交部主管官员和对拉宾有影响力的经济界头面人物的工作。以色列外交部的主管官员是负责处理以中两国外交事务的官员,与拉宾友谊甚笃的以色列经济界巨擘埃森贝格同我国长期来有良好的合作关系,同时对拉宾的决定有异议,故我们决定先做他们的工作,再通过他们直接、间接对拉宾施加影响。埃森贝格多次面见拉宾做说服工作,并及时在拉宾和我们使馆之间进行沟通;其他有关友好人士也不断将其了解到的情况及时告诉我们使馆。他们的协助对中方及时掌握情况、加强工作的针对性,从而促使拉宾改变决定起了重要的作用。

四是以要求以方遵守政治承诺为主,同时向对方表明,政治关系无麻烦将大大有益于双边经贸、科技关系。我们反复强调李登辉不管以什么名义、什么借口访以,都改变不了此访的官方性质和他制造“两个中国”、企图分裂国家的政治实质,要求以色列政府以实际行动表明其坚持一个中国的立场。此外,我们也向对方表明,中国愿意以积极态度进一步发展、扩大两国经贸、科技合作。

如条件成熟,中国主管经贸和科技工作的高层领导都有意在近期内访问以色列,与以方讨论进一步加强两国经济、贸易和科技合作的问题。

五是以正面做工作为主,但又保持必要压力。我方除反复重申我对台立场外,强调中以关系良好,这是双方长期来共同努力的结果,今后应继续努力,以使两国关系锦上添花。为此,希望以方眼光放长远一些,不为眼前一点小利所动。若以方在李登辉访以问题上严重伤害中国人民的民族感情,中以关系势将受到严重影响,这对双方都是不利的,也是中以双方都不愿意看到的。

六是为防节外生枝,早谋对策。对以色列方面可能以宗教为由提出不好拒绝李登辉以基督徒身份到耶路撒冷朝觐的问题,我们的立场是:李登辉访以是重大的政治和外交问题,而不是什么宗教、私人访问的问题。这个政治、外交问题不能与其他问题搅在一起,只能由以色列政府来处理。同时强调,以色列政府在中以两国建交前能有效地控制以色列不同台湾当局发生官方、政治关系,现在也同样有能力妥善处理李登辉访以问题。此外,林真大使还分别会见了以色列负责司法和宗教事务等有关方面的领导和人士,从正面有针对性地做工作,争取他们的理解和支持,不去干扰拉宾处理政治、外交问题。

由于中方决心大,准备充分,策略对头,交涉有力,我们终于促使拉宾改变了原来的决定,取消了李登辉访问以色列的计划,使李登辉访以成为一枕黄粱,取得了这场外交斗争的最后胜利。⑬

(作者曾任中国驻莱索托大使和驻纳米比亚大使)